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

唐代都市文化 与诗人心态

谢遂联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

唐代都市文化 与诗人心态

谢遂联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都市文化与诗人心态 / 谢遂联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308-08115-3

I. ①唐… II. ①谢… III. ①城市—文化—研究—中
国—唐代②唐诗—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C912.81
②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9594 号

唐代都市文化与诗人心态

谢遂联 著

责任编辑 周卫群
封面设计 联合视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富阳市育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8115-3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目 录

绪 论	1
一、古代诗歌与都市文化的关系	1
二、都市角度诗歌研究的困难	3
三、文化心态角度的选择	6
四、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10
五、研究方法与主要内容	14
六、相关概念及创新之处	16
第一章 政治都市本质与诗人心态	18
第一节 京城诗中的政治性夸饰与政治性讽谏	19
一、政治性夸饰与政治性讽谏相交织的流行趣味	19
二、原因分析	22
第二节 诗人的恋都心态	25
一、唐代诗人恋都心态的表现	25
二、恋都心态的形成原因	30
第三节 疏离与缅怀	31
一、个人化抒情中的疏离心态	32
二、集体性情感中的眷念与缅怀	34
第二章 商业文化与诗人都市文化心态	42
引 言	42
第一节 心迹离合：士商关系与诗人心态	46
一、士商行迹的重合及其意义	47
二、士与商在心态上的分离关系	51
三、心态成因分析	57
第二节 士妓关系与诗人都市文化心态	61
一、士人与妓女：一个都市文学话题	61
二、现实层次的士妓关系及士人心态	63

三、精神层次的士妓关系及士人心态·····	67
第三章 都市节庆民俗与都市文化心态 ·····	72
第一节 节日与市井生活表现·····	72
一、节日与都市繁荣表现的关系·····	72
二、狂欢上元与都市繁荣描写·····	74
三、上巳、寒食、清明与都市繁荣描写·····	79
第二节 都市节庆繁华的文化心理蕴涵·····	89
一、文人与市井的文化对视·····	90
二、政治性都市下的都市文化心态:狂欢与社会道德相一致·····	92
三、“春来百种戏,天意在宜秋”——农业文明背景下的都市文化心态·····	94
第四章 都市生存与焦虑 ·····	97
引 言·····	97
第一节 都市安身焦虑·····	101
一、“十年京师寒且饿”——衣食困境·····	102
二、都市居住问题·····	104
第二节 都市人际焦虑·····	107
一、都市交游与焦虑·····	107
二、夷门典故、平原君典故的文化心态内涵·····	115
三、政治性焦虑·····	116
第三节 都市前景焦虑·····	121
一、都市与科举焦虑·····	121
二、山苗与涧松·····	128
三、长安公子与贫女·····	133
第五章 山水田园与都市焦虑纾解 ·····	138
引 言·····	138
一、古代都市的农业经济背景·····	138
二、农业经济背景对于焦虑纾解方式的影响·····	140
第一节 部分山林田园诗歌的都市背景及焦虑纾解·····	142
一、都市与山水诗、田园诗发展的关系·····	142
二、部分山林田园诗歌的都市背景及焦虑纾解·····	147
第二节 都市园林别业与焦虑纾解·····	152
一、唐代园林分布概况·····	152
二、园林与都市文化之关系·····	154

三、园林别业与焦虑纾解	157
第六章 宗教与都市焦虑纾解	168
第一节 宗教与都市文化之关系	168
一、城市文化史的重要话题:城市与宗教	168
二、三教调和与士人阶层对宗教的实用态度	169
第二节 佛教与都市焦虑纾解	175
一、佛教与都市文化之关系	176
二、寺院环境与都市焦虑纾解	180
三、佛教观念与焦虑纾解	183
第三节 道教与都市焦虑纾解	190
一、道教与都市文化之关系	190
二、道观环境与都市焦虑纾解	194
三、神仙幻想与焦虑纾解	197
四、辽鹤意象与焦虑纾解	203
结 语	207
参考文献	209
附录一:长安及近郊园林别业与相关诗作	220
附录二:洛阳及近郊园林别业与相关诗作	229
附录三:淮南道、江南道园林别业与相关诗作	233
附录四:城邦文化的诗性阐释——论《诗经》中的都市诗歌	235
后 记	241

绪 论

一、古代诗歌与都市文化的关系

作为一种聚落形态,城市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如果以有一定的规模、有一定的永久性的大型建筑、有一定的手工生产场所和交换贸易场所、有一定的城市基础设施、有比较密集的居民居址等五条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城市,夏朝中后期的二里头古城可视为城市形成的标志。^①

在殷墟遗址的发现中,我们知道殷墟曾是一座起码十平方里以上面积的城市,其市区内版筑房屋、宫庙、手工作坊并存。从其房屋遗迹的密集程度看,殷都当时的人口已经相当集中。^②唐人张守节“正义”的《史记·殷本纪》引《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③如果将这段文字记载和遗址的发现相对证,应当能反映出商代城市的发展及其规模。到了西周就已经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建设高潮,从此,城市对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此后的历朝历代,中国古代都市在同时期的世界都市史上均占据着重要地位,并长时间地走在前面。战国时的邯郸、临淄,秦代的咸阳,汉代的长安、洛阳,魏晋六朝时期的洛阳、建康等都是其所属时代著名的大城市。此外,遍布全国的城市不少都是郡县治所,是一个地区的政治中心,也是王侯、官僚、贵族等豪富之家的集中地。唐代更是迎来了城市发展的一个高潮,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城市的繁荣发达有着许多史料的支撑。

对中国古代城市问题的研究,在历史学领域尤其是经济史、社会史领域的研究比较充分,成果颇多。历史学角度的城市问题研究并不能代替文学文化史角度的

① 庄林德、张京祥:《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 页。

② 吕振羽:《殷周时期的中国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2 年版,第 59 页。

③ 司马迁:《史记》卷 3,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06 页。

城市问题研究。因为,不同学科,其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同一首诗,史学研究者看见的可能是“史实”,并将之作为“以诗证史”的材料;而文学研究者看见的可能是创作主体的内在精神风貌,因而侧重于对城市生活的主体——人的精神状态进行研究。与历史学领域的城市研究相比,文学史研究领域对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就这个意义上说,从文学角度出发对古代都市进行研究有着必要性。

事实上,中国古代诗歌也确实与都市有着密切的关系。单就诗歌创作主体而言,从汉代开始,中国诗歌史上有作品存世的诗人大部分与都市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其主要表现方式有仕宦、游历、交游等,从隋唐开始,更要加上另一重要因素:科举。据傅璇琮先生考订,唐代每年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人数有二三千人。^①诗人与都市的这种密切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诗人的创作风貌。以唐代为例,李白曾在长安生活数载,杜甫十年困守长安,白居易除了在长安、杭州、苏州、洛阳等地担任官职之外,最终终老洛阳。据李廷先先生统计,在唐代有写扬州的诗歌作品两百多篇,涉及诗人六十多人,他们或到过扬州,或在扬州为官,而居于安史之乱以后的约十之八九。^②即使少数刻意保持与都市距离的诗人,在其山林高义的表述中也往往有一个潜在的都市作为参照。正因为绝大多数诗人与都市有着各种密切的关系,很多诗作的产生就有着或明显或隐晦的都市背景。据戴伟华教授统计,在唐代诗歌创作的整体格局中,以京都为创作地点的作品占有绝对之优势,尤其是初盛唐时期大量的宫廷应制诗更是以绝对的数量称霸诗坛,其基本形式有三种:一是以文馆为中心的创作;二是以帝王为中心的创作;三是以朝廷为中心的创作。^③“在整个唐诗创作中,陕西的诗作占绝对优势,第二位是河南,而河南约是它的三分之一。这说明首都在诗人活动中的地位,佐证了文学史上强调的一个观点:长安作为唐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唐代文人很少有一生未入长安的。”^④唐代陕西、河南之所以诗作数量多,与长安、洛阳这两个都市是有密切关联的。陈尚君教授《唐诗人占籍考》一文(收录于《唐代文学丛考》一书)据《唐才子传校笺》(傅璇琮主编,中华书局1987—1995年版)、《唐诗大辞典》(周勋初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等成果,对唐代诗人的占籍情况进行了统计:在京畿道226位诗人中,京兆府(雍州,今陕西西安)占了186人;在都畿道200位诗人中,河南府(洛州,今河南洛阳)占了120人。^⑤

这样看来,古代诗歌与都市文化确实关系密切,而这一关系已开始日益受到重

①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页。

② 李廷先:《唐代扬州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28页。

③ 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5页。

④ 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7页。

⑤ 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170页。

视。近年来,一些文学论著中常常涉及文学与城市的话题,尤其在古代小说、古代戏曲研究领域表现得更明显,在宋词研究领域也出现了这一趋势。但是在诗歌领域对古代都市文化的研究还比较欠缺,这不仅使古代文学研究缺少了一个重要的考察角度,也使对当代都市诗歌的研究缺少了中国传统语境。考虑到诗歌在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高居于主流文学之殿堂这一重要因素,这种欠缺已经越过了单纯的古代诗歌研究层面,而上升为带有整体性的古代文学文化研究的不足。

近年来出现了两种趋向试图改变这一局面。第一种趋向简言之是以“地域”概念代替“都市”概念,以弥补古代诗歌研究中都市角度研究的不足。如戴伟华教授的专著《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长安及其他城市就占据了相当重要的篇幅;又如魏景波《唐代长安与文学》(复旦大学2003届博士论文)就唐代长安与文学的关系进行了专门的论述。这些论著从地域文化角度,对于文学与具体城市的关系有较深入的论述,但是在论述中往往限于地域特征,对于“都市”相对于山林和田园而言的特征较少涉及。

中国古代城市自秦朝开始建立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政权后直到清代漫长的两千多年中,由于政治体制的同一性,城市性质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其间,尽管经历了坊市制度从建立到崩溃的整个过程,尽管也有北宋以来的市民社会及市民文化的微弱发展,但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古代城市的这一属性。因此秦朝以后的城市,不管哪一朝代,也不管是长安、洛阳还是扬州、成都,作为封建城市,在各具特色的同时,它们都具有相比较乡村田园而言的超越具体城市的共同属性。历史的起点也就是逻辑的起点,对中国古代都市文化的考察,笔者认为首先要尽量还原中国古代都市在历史时空下的本质属性,在此基础上才能从诸多分散的与都市密切相关的诗歌文本中发现共同的规律性的因素。

当今古代都市文学文化研究的另一种趋势是多以“市井”概念代替都市、城市概念,以市井文学、通俗文学概念代替都市文学概念。或许与这一概念理解相联系,古代都市文学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小说、戏曲、词等市民性表现得比较充分的文学体式中,诗歌领域涉及很少。对古代都市文学文化的研究如果仅限商业文化影响这一个维度,毫无疑问是不够的,在中国几千年来的都市文化史上,商业文化因素并不是中国古代都市本质的第一要义。

两种趋向似乎有明显的分界线,大体而言,对唐代及以前的都市文学研究偏向于地域概念;对宋代以后的都市文学研究则偏向于以市井概念代替都市文学概念。

二、都市角度诗歌研究的困难

诗歌领域的都市文学文化研究之所以长期被忽略,其原因是复杂的。

首先,对都市文学文化的研究确实存在着实际的困难,孙逊先生对此有过

论述:

正如西方学者把都市比喻为一个“煮开的大锅”，它不仅什么都有，在内容上无所不包，而且由于都市生活本身就建立在高度“差异性与异质性”的基础上，所以它在天性上拒绝整齐划一，或者说很难从中找到清晰的规律与结构。另一方面，对于都市文化研究来说，尽管在内容上可以无所不包，但在逻辑分析上却很少有它自己的东西……这种状况不仅很容易导致都市文化研究在内涵上“空心化”，同时也是它在学科建设上面临的最大学理障碍。^①

孙逊先生在此重点论述的是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困难，其实，对于古代都市文学文化研究而言，这样的困难同样存在。由于“都市”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的游移不定，研究内容有时难免泛化或者空心化，似乎存在着明显的学理障碍，遂使诸多研究者止步不前。

其次，研究者对都市概念的理解也是重要原因。部分研究者往往无视古代都市的特点，将古代都市等同于现代都市，以现代都市观念去比照古代都市文学文化之事实，比照的结果自然是对古代都市特性的忽略。由此造成古代文学文化研究中两种明显偏向：一是否认中国传统文学中都市文学的存在，认为既无“都市”（现代意义上的），何来都市文学；二是将“市井文学”、“市民文学”概念等同于“都市文学”概念。

“市井文学”、“市民文学”概念的提出是有特定的文学文化背景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鉴于文学领域存在重视正统文学而轻视俗文学和大众文学的偏向，胡适倡“白话文学”概念，郑振铎倡“俗文学”概念，影响深远。^②但近几十年来，在古代都市文学文化研究领域，情形恰恰来了个颠倒，人们论都市文学，多提“通俗文学”、“市井文学”，而很少提及以文人为主的都市文学。翻检古代都市文学文化研究的有关论著，研究者往往以“市井”、“市民”等概念为立论根基，由于其概念中蕴涵的商业文化因素与现代都市概念有相容之处，论者相互沿用。单就通俗文学、大众文

^① 孙逊：《“都市文化”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理论 and 实践意义》，《光明日报》，2005年12月6日。

^② 胡适在《白话文学史·自序》（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中说：“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只可叫做‘古文传统史’罢了。”他又解释说：“我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得很大，故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何谓‘俗文学’？‘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

化层面而论,着眼于“市井”、“市民”等因素立论的确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如果着眼点在于都市文学,则明显地忽略了古代都市精英文学文化这一重要方面。其实,“都市文学”概念在外延上要远远大于“市井文学”和“通俗文学”概念。当今古代都市文学文化研究中对于诗歌有意无意地忽略,客观地说,只是研究了古代都市文学中的“市井文学”或“市民文学”。这导致了诗歌、散文研究上出现了一个由概念遮蔽而出现的盲区,影响了对主流的正统的传统都市文学的研究。近年来小说、戏曲、词体研究等领域的都市文化研究之所以比较充分,与这些文体从起源就带有市民文化色彩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诗歌与都市关系的研究一再受到忽视,因为诗人群体的主体——士人阶层往往与市井有着较远的距离,并且诸多与都市情境密切相关的诗歌作品没有市井色彩的商业外壳。

其实,如果完全以西方现代意义上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上的都市观念而论,甚至市井文学也同样被认为不是真正的都市文学:

试图从理论上严格定义“都市文学”是困难的,因为“都市题材”就是一个极其暧昧的说法,在大多数小说中,所谓“城市”仅仅是一个徒有其表的空间或背景;而那些“小巷深处”不过是都市里的村庄而已。人们经常以街道小巷来冒充城市的根本内容,那些故事延续了“勾栏瓦肆”的市井气,它们充其量也就是“市井文学”。^①

毫无疑问,古代都市文学文化研究不能这样削足适履地简单比照,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起点出发,在还原中国古代都市本质的基础上,选择恰当的角度对古代都市文学文化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都市文化角度的诗歌研究带有题材研究色彩,因此也有着一般题材研究的困难。正如葛晓音教授所言:“研究某一类诗歌题材或形式的纵向流变,较难掌握的是研究对象的界定,以及贯穿其中的主线。中国诗歌的任何一种题材或形式都不可能具有严格的界定范围,一定会有部分作品界限不清,与其他种类相混淆。所以几乎选择单一诗类进行渊源流变研究的课题都难免遭到概念界定的质疑。”^②这的确也同时是都市角度诗歌研究所要面临的一大难题。

上述几方面所揭示的是都市文化角度的诗歌研究中共同的困难,同时,客观地说,这也是本选题研究中所要面临的实际困难。但是上述困难并不是我们无视诗歌与都市关系研究的理由,如果不对古代都市与诗歌的关系进行研究,至少在以下

^① 陈晓明:《中国城市小说精选·序》,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② 葛晓音:《秦汉魏晋游仙诗史研究的新创获》,《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第23页。

两方面是难以说通的：一是中国古代都市的繁荣发达；二是文人与都市及都市生活的密切联系。对于研究中可能的困难，孙逊先生说得好：

但另一方面，这也并不构成否定都市文化研究存在的理由，因为单靠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等学科“单兵作战”，不足以在整体上与深层结构上完成对都市文化进行阐释与研究。^①

更何况，诗歌体式对古代城市文化研究还有着特殊的含义。诗歌在两千多年来的文学史上一直是主流文学样式，其主要创作者为文人，在中国传统文化框架下，居于文化主流地位的文人以主流文学样式的诗歌所表现出来的都市文化特征应该说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本质的方面，这些文化特质作为潜移默化的因素，甚至已经内化为我们关于都市的思维方式并积淀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三、文化心态角度的选择

面对都市文化角度诗歌研究上述困境，只有找准了研究的切入角度，研究活动才具有真正的可行性。都市文化心态角度的选取或许不失为一可行策略。理由如下：

第一，人是文学实践活动的主体，文学史是人的精神主体运动的历史。“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②勃兰兑斯不把文学一般地视为“人”学，而将文学视为人的精神主体运动的历史，这无疑是深刻的。文化心态角度的研究无疑是文学史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宁宗一教授在《心态史研究与文学史建构——一个层面的考察》一文中说：

在多元化的文学史叙述中，我则比较关注心态史这一重要层面。这是因为，我们期盼一部成功的文学史，不仅仅是从中看到文学的史实及其发展的一般轨迹或规律。我们期望看到的是凝结在文学文本中所反射出的作家精神的主体运动，从而看到时代的灵魂，民族的灵魂。因此审视文学历史运动，不能忘了窥探人的世界和精神历程，所以，文学史家在审视文学发展的历史时，必须深入到作家的思想、感情、性格、气质中去，特别是深入到游移不定的心态中去，这样才能显现出“不朽”的神韵来。^③

① 孙逊：《“都市文化”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理论 and 实践意义》，《光明日报》，2005年12月6日。

② 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③ 宁宗一：《心态史研究与文学史建构——一个层面的考察》，《东方丛刊》，2006年第2期，第29页。

同时,对于文学本质的上述认识对我们选择都市文学的研究角度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城市既是空间概念,同时也是个居民概念。“城市既指辖区又指居民,既指物质环境又指集体生活单位,既指有形对象又指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结合。”^①“城市在同一地点集合了一些各不相同的居民,这些居民在共同的空间内并存并相互影响。某些分析注重于居民,与此相反,另一些分析则注重于空间。”^②都市文学研究毫无疑问应该注重都市生活的主体(居民),并尽量地将这一主体与特定的空间因素(都市情境)结合起来。因此,文化心态角度的选择兼顾了都市生活的主体与空间这两方面的因素。

都市是一个不同于乡村田园的文化生态系统,或者说,都市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场。封建都市尽管在本质上不同于现代都市,但有几点是无可否认的:第一,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形态(城墙、宵禁),因此与自然的关系必然起变化;第二,它是政治导向的都市,文人居于其中很少有工商业的目的,绝大部分活动是围绕政治、文化而进行的;第三,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乡村聚族而居的大家族生存方式;第四,城市有相对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为数不少的平民商人也是都市社会中的重要成员。

这几方面的特点必然对诗人心态构成影响,并在大多数诗人都市情境下创作的诗歌中反映出来。同时从大量此类诗歌中,也可反证出古代都市上述鲜明的特征,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都市的文化特征。美国学者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说:“我们不能将城市仅仅看成是自身存在的事物,而应该将其理解为由它的市民感受到的城市。”^③每一个脱离了原来乡土的人际关系、血缘关系而进入到都市文化生态系统中的诗人,必然面对着与原来的生存环境大不一样的都市环境,他必须首先适应这一环境。适应过程中,都市环境固然会改变着诗人,但他在适应过程中同时也影响并改变着都市文化。“人是城市发展的最重要的变量。因为人是文化创造的主体,又是文化创造的最积极、最活跃的力量,所以城市的兴盛和衰退无不与人的流动密切相关。同时,人又是文化的适应者,一旦受到某种文化的影响,他又会适应这种文化在新的条件下去发展这种文化。”^④

在文学活动中,人不但是思维主体和认识主体,还是我们认识的目的,文学史的研究只有紧紧抓住“人”以及“人的灵魂”这两个核心,才有可能真正深入地理解上述命题的理论蕴涵。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说:“历史的知识是关于心灵在过去曾经做过什么的知识,同时他也是在重做这件事;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

① [法]伊夫·格拉夫梅耶尔著,徐伟民译:《城市社会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② [法]伊夫·格拉夫梅耶尔著,徐伟民译:《城市社会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③ [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④ 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页。

在之中。因此,他的对象就不是一种单纯的对象,不是在认识它的那个心灵之外的某种东西。”^①因此对于诗人在都市文化影响下的心态的研究是必要的。

目前,学术界对于诗人心态的研究,比较重视历时的因素对于诗人心态及诗歌创作风貌的影响,如政局变化、个人经历等(这无疑是必要的),但是比较缺少从特定文化空间出发的对于诗人心态的研究。本选题试图将都市作为一个文化场,探讨其对于诗人心态的影响,在这方面做出初步的尝试。

第二,文化心态角度适合于诗歌的表现特点。

诗歌体式与其他文学体式相比有其特殊性。与小说、戏曲、词等体式相比,诗歌在表现古代都市风情方面有时候确实不如小说,甚至也不如戏曲和词体。但是与追忆性的城市笔记小说比较,它又具有即时性和当代性,能实时地同步地反映出文人的都市印象。因此我们认为诗歌在表现都市文化上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蕴涵。很多抒情之作不像以风物景观为内容的作品,表面看来并无明显的地域特色或都市特色,此时都市只是淡化成为一种情感或情绪产生的背景而存在。但是,诗人所抒发的情感又的确带有都市色彩,只有对诗人的情感特点、心态特点进行分析,才能抓住都市的本质特征。

中国诗歌史素有“言志”、“缘情”两大传统,然而,不管是“言志”还是“缘情”,都不可避免地诗人的心态联系在一起。诗歌在表现心灵的深度上是其他文体所不可及的,如果仅仅将诗歌当做一般文献来诠释,无视诗人生命中的苦痛、激情与召唤,无论如何都是有缺陷的。

可以说,选择都市文化心态角度作为突破口既照顾到了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从而避免了研究的泛化和空心化,又照顾到了诗歌体式相对于赋体、小说、戏曲等其他文学体式所具有的文体特点,并且有着较充分的学理依据。

第三,都市概念具有特定的内涵,同时又包罗甚广,要想把握其研究内容是不容易的。而心态研究或许可以作为连接都市各因素的中介,藉此对于诗歌与都市文化的关系进行一定的揭示。关于心态研究的这一作用,有学者作过论述:

一代文学之形成,表面看来虽然是一代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要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但事实上,文学作为文人创造的精神产品,它在诞生之前,不论曾受到过多少外在的影响,也不论这影响有多么深刻,它们终须经受作者情感的过滤和心灵的淘洗,内化为一种难以清楚言说但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文化心态,而文学便是这一文化心态再度外化的直接结果

^① [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7页。

之一,也是这一文化心态较为精致的表现形式之一。^①

左东岭先生也有过如下论述:

我认为,要将其他领域中的因素落在文学研究的实处,就必须找到这个中间地带的连接枢纽,这个枢纽就是综合各个领域的关键。我以为心态研究是可以作为这个连接枢纽的。心态也就是作家对于社会的理解,是他面对时代的种种变化时的心理状态,他是一个立体的、包括了理性与情感诸因素的浑融之体,是可以起到连接文学与社会诸要素的中介作用的。^②

都市各因素固然会影响到诗歌的创作及风貌,但很多时候并不直接作用于诗歌,因此必须寻求连接诗歌与社会诸要素之间的中介,诗人于都市中的文化心态恰恰可以作为连接都市与诗歌创作之间的桥梁。

而心态研究本身也具有相比于其他研究角度的优点,对此,有学者论述说:

文人心态是极富统摄力的,它与文学的关系也要比许多外在的显示和传统要素更直接、更切近。这使我们从文人心态入手来研究一代文学,或从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追踪、逼近一代文人心态,在学术的层面上有了实在的价值和意义,而不像人们惯常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把这项研究视为无根底的玄谈。^③

如上所述,选取都市文化心态角度进行古代都市诗歌研究不失为一可行策略。第四,立足于诗歌文本的诗人群体心理研究。

“只有通过心灵而且由心灵的创造活动产生出来,艺术作品才成其为艺术作品。”^④诗歌文本是诗人心灵的凝聚场,因此,诗歌文本往往是分析诗人心态的最好凭借。立足于诗人的诗歌文本,我们有可能通过文本与诗人进行将心比心的心灵的对话。贺仲明教授在其专著《中国心像》的“前言”中说:

① 池万兴、刘怀荣:《梦逝难寻——唐代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② 左东岭:《多维视野与心态研究》,《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1期,第10页。

③ 池万兴、刘怀荣:《梦逝难寻——唐代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④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9页。

我认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真实地反映他的内心世界的只有他的文学作品。也只有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他才是最为真诚、最为可信的。其他如作家对话和各种创作谈,都不如他的作品揭示他的心灵更真实客观。所以我认为,在任何时代,我们都不能够完全依靠作家的自我谈话去评判一个作家,也不能将作家的生平道路与他的文学创作混到一起。只有从文学作品出发,既不拘泥于将作品思想与作家心理简单对应,又要深切地把握这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才能捕捉到作家心灵在文学世界中的真实跃动。^①

唐代时间跨度大,不同的诗人个体由于环境与境遇的不同,其生命状态及体会也会有所不同,由此对都市的看法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性,但是在唐代诗人大量关于都市的作品中,往往有一些关于都市的情绪类型,超越具体作家的具体境遇,反复地出现于作品之中,这些反复出现的情绪类型累积起来构成了文人对于都市的几种心理范型。

“文学思想研究中的心态研究就其实质而言乃是一种群体心态的研究,需要舍弃一些次要的个人因素甚至地域因素,但又不排除某些个人与地域因素会在群体心态中占有重要位置。”^②士人心态研究一般着眼于对于群体心理的考察,更多地关注的是某一时代的士人心态倾向,它与单纯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有很大不同。由于以社会群体心态为研究重点,研究中对士人个案心态涉及较少,即使对一些重要士人的心态个案研究,也是为了考察那个时代总体的士人心态倾向。

本论著着眼于唐代诗人这一社会心灵的总体,重点进行综论性质的宏观研究。“文学的历史则是集体的时代的文化心理的连续呈现,它依赖于集体意识,依赖于对社会集体心理的明彻揭示”^③,笔者相信对唐代文人都市心态的梳理将有助于揭示民族深层的文化记忆。

四、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本选题属于文学史、都市史与心态史的交叉研究,目前尚无直接的研究成果,但是,有不少学者做了许多相关的基础工作,现有文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立足于都市研究的成果

立足于都市研究的成果包括两类,一是侧重于历史角度的都市研究成果;二是

^① 贺仲明:《中国心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② 左东岭:《多维视野与心态研究》,《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1期,第11页。

^③ 许建平:《建立心态文学史学刍议》,《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第138页。

侧重于文学文化角度的都市研究成果。

侧重于历史角度的古代都市研究成果颇多,对于本选题有着重要的价值。曹洪涛《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一书(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年)对于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进行了概括而精要的论述。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对都城制度发展历史进行了探索,认为中国古代都城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先秦到唐代,是封闭式都城制度时期;后一阶段从北宋到明清,是开放式都城制度时期。刘运勇《西汉长安》一书(中华书局,1982年)对于西汉时期长安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论述。张继海《汉代城市社会》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从社会史角度对汉代城市社会的聚落形态、物质结构、公共生活、学校与祠庙、社会问题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一书(台湾学生书局,民国81年)其上篇对六朝建康城的经济基础、园宅、市廛民居与治安等方面进行了较细致的论述,并将六朝建康城与北魏洛阳城进行了比较论述;其中篇重点探讨浙东城市与士族;其下篇重点探讨中古时期的都城坊制问题。卢海鸣《六朝都城》一书(南京出版社,2002年)对六朝时期建康城的规划营建布局、宫城都城建筑、市场、里坊、园林及宗教建筑等进行了探讨研究。张永禄《唐都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对长安的立都条件、都城的营建、布局规划、建筑制度以及都城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进行了综合研究,可称为唐都长安城的专史。黄新亚《消逝的太阳——唐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1996年)将学术性与趣味性相结合,对唐都长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长卷式的介绍。

同时,西方学者的城市理论著作也对本选题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如美国学者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认为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支柱,它以全球城市发展为视角,探究了数千年来城市和都市生活的进化过程,有利于从全球城市发展的角度予中国古代城市以一个相对的定位。其他如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也从世界城市史角度,对中国古代城市特性有着诸多论述。

近年来,还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侧重于文学文化角度的都市研究成果。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一书在相关成果和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将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引入纵深,重点考察地域文化与诗歌创作的关系,探讨了文士籍贯地理分布的状态及其内涵,并分析了诗人占籍在文学研究中的意义。

阎琦《古都西安——唐诗与长安》一书(西安出版社,2003年)以唐代诗歌为主要材料,较全面地描述了唐代长安各阶层的社会生活、长安的四时、节俗、技艺以及都市胜迹。樊光春《古都西安——长安道教与道观》一书(西安出版社,2002年)对长安与道教的关系进行了从秦汉到明清的历时的梳理。李志慧《古都西安——汉赋与长安》一书(西安出版社,2003年)对汉赋与长安的关系做出了描述性的梳理。